

在此前的香港電影節，「2015大師微電影」集結了黃建新、蔡明亮、嚴浩、慕森、麥馬巴夫四位國際重量級導演，而我們所熟悉的「美好」系列，也走過了又一年。2012年第一屆大師微電影時台灣導演蔡明亮就曾加盟，其拍攝的極具個人特色的《行者》上線後引發很多網友的共鳴和討論，《行者》也在國際各大電影節上進行展映並獲獎，斬獲了洛杉磯國際電影節「最佳劇情短片」獎。今年蔡明亮推出了《行者》姊妹篇《無無眠》，不同的是此次李康生身着僧袍行走在東京街頭，較之前純粹的行走延展出更多的劇情和寓意。而我們也與這位重量級電影創作者展開對談，走近他的電影人生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莫雪芝



文=香港文匯報 蔡=蔡明亮



文：這次拍《無無眠》有特別想表達的內容嗎？

蔡：其實我就是很被動，邀請我來我就接受了，香港電影節協會主席王英偉也不止是這次邀請，但這一次我正好有空。我很被動的。人家給你錢讓你拍東西也不管你拍什麼，於是就來拍。

也沒有什麼想表達的。我拍東西從沒有覺得特別要表達什麼，我的電影都是概念跟主流相反，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，你們做那樣，我就做這樣，因為我做那樣去追求市場也不會太快樂。我很明白大眾票房、觀眾口味都很虛幻，沒有一個時代的觀眾口味是好的，老實說——當然有好的觀眾，但那不能用票房衡量，這是現實。

所以我就是一路拍我喜歡、像樣、像個作品的東西，就這樣去操作電影器材。如果老是別人做什麼你做什麼，那沒有意思。我的個性就是覺得我的作品應該會對社會有意義——讓你們覺得這世界不止是某個樣子。王主席找我拍時，不會問我想拍什麼，那我想短片負擔也不重沒有壓力。我的腦袋裡這幾年拍短片時，都想拍行走（長片不見得），於是這兩年多，我走了六部，加上這個七部，每部其實都問不出主題。

文：就像當初《郊遊》某種意義上也沒有主題？

蔡：《郊遊》的主題是人生。但當你要說主題時，它就像說教，那樣的電影沒有用處，我們看到上千萬部電影都有主題了，但是有改變這個世界嗎？沒有，戰爭還是戰爭，貪婪還是貪婪，說教給的警惕都沒有用，我的電影要做一個沒有價值觀的東西。

電影有文學與藝術品的力量

文：您拍了這麼多短片和長片，在把握這兩種題材時處理方式會有怎樣不同？

蔡：對我來說逐漸都沒有負擔。年輕一些時，可能會在乎如果這個不賣座後面還有人找我拍戲嗎？但是很奇怪，我每個電影都不賣座還是繼續有人找我拍戲——是老天眷顧我。其實全世界認真想一想，誰會找我拍戲？一個我這樣的導演，二十幾年沒市場沒上片，盜版商都不一定會賺錢，那到底誰找我拍戲呢？我覺得是一種很神秘的力量牽引了這些人覺得，如果投資我，總會有不同一般的作品出來。畢竟他們也要很辛苦地去宣傳。

十年前韓良露跟我說，蔡明亮你太聰明了，人家拍電影都想著市場，想著討好戲院老闆和觀眾，但你好好像就討好20個人。但這20個人就發揮出很大的力量。像《青少年哪吒》現在重演，美國又買了藍光版權，它是小小的經營，可是走得很快，它有一種像文學、像藝術品的力量，不在於一時。後來我連不上片賣不賣座都不管了。有時甚至都不太想人看。如果說我拍了一個短片要去電影節，而版權在我身上，那我都不去了，我很挑，重要的我才去，我留著那些片子儲蓄——可能某個時間它們的力量在美術館就會爆發出來，還更強烈。

總之我的作品要回美術版權，我不在乎誰喜歡不喜歡，慢慢我覺得這個方式無欲則剛，讓我很自由。可能也讓我特別清楚什麼重要不重要？像這次記者會時優酷在做宣傳，對我來說都像外話，我也和他們很善意地直接反應，你們拿到很多不同作品，應該負起讓網民素質提昇的責任，

文：您覺得電影可以承擔這麼大的責任？

蔡：當然是，但電影也可能把人搞得很平庸。

既然你去找一些好導演來參與拍一個網絡系列，宣傳中要更加費心，不要光有話題給網民，光順應網民的接受度。試想如果你把我塞在所有喧鬧的音樂中，這個和我的風格就不一樣。

我記得「台灣新電影」剛起來的時候是我大學時代，那時台灣很像現在大陸，也是商業掛帥，每個電影的預告片幾乎都差不多，都是同樣的明星的臉。但是「新電影」出來之後，「作者」的概念出現。預告片都不一樣了。我們在戲院看到《油麻菜籽》的預告片，三分鐘，很有氣氛在荒郊野外慢慢推，大不大膽？

而二十幾年了，中國內地還在做這種事，有點可惜。我覺得其實碰到我們這種導演還是要珍惜。我是很樂意給一些建議的。為什麼我們這次要參加「大師微電影」？因為為了已有將近四十年歷史的香港電影節。如果沒有香港電影節，可能香港的觀眾素質不是這樣，就像台灣金馬影展，它不止是個電影競賽，它一樣有影展，很多觀眾都是因為國際電影節眼界大開，導演的素質要改變，觀眾的素質也要改變，相輔相成。

我敢說很少有人像我拍電影時這麼有責任感。也許人家看不懂，但良藥苦口。我的電影也是一種娛樂，可能層次不太一樣，我自己沒有辦法，需要很多有心人。包括香港電影節的主席，大家都真的希望電影人的處境越來越好——不止是有資金，還有自由創作，這個自由需要觀眾support。放在這個時代，要培養更多質量更好的觀眾。我更在乎質，量是很虛幻的——有了，是讓社會變得更好。

「拍片對我來說變得非常容易」

文：這也是無形中契合了「美好2015」嗎？

蔡：對。你說2015有什麼美好的事嗎？好像過去一年2014年就不美好，有那麼多空難，但是我們拍電影總是跟所有創作一樣，要讓人心更良好清澈。我從來不擔心娛樂少，現在反而娛樂太多了，以至於有點麻木變成只是填補，因為大部分人不知道怎麼過活，那個娛樂它也不快樂。

文：您曾經提到拍完《郊遊》不想再拍長片？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多在美術館與觀眾見面？

蔡：2013年《郊遊》參加威尼斯電影節時，我已經常常和美術館合作，美術界比電影界更看重我，美術本來也同意電影是藝術，美術界的人看到我的作品心有戚戚焉。那美術界一樣有問題，除了炒作一些拍賣那種，事實上美術館誰在看？

剛好這幾年台灣有在推美術館，明顯大家會比較

無欲則剛 蔡明亮

「我想培養更有質的電影觀眾」



如果我的電影用正常管道發行，真正問題是沒有市場。我相信將來我的通路不是戲院，而是美術館。美術館適合讓觀眾重新去體認電影是什麼。

文：戲院通路不打算再碰？

蔡：也不是。我自己的想法是，老實說電影院還是最適合看電影的地方，但是現實你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它是一個賣場，只賣商品不賣藝術，所以這是一種手段，我在台北的美術館辦《郊遊》，跟一批一批老師帶著來看我的電影的小朋友說，你們來美術館來晚了，應該更小的時候就來。但看我的電影，看早了，長大一點再來看。我真的希望說將來作品在戲院上映，會有觀眾排隊來看，但不是被市場宰割。

文：所以您期望用美術館去培養觀眾，培養更多觀眾之後再讓他們慢慢進戲院？

蔡：是的。亞洲電影觀眾大都是電影院培養出來的，而歐洲大部分電影觀眾是美術館從小培養出來的。亞洲太功利了，我覺得應該要收一點，因為人生不是只有功利。

文：經過這些年的創作之後，對電影創作本體的看法有改變嗎？

蔡：全世界的電影都越來越不好了。我從上世紀80年代之後開始覺得美國電影不好看，現在我都看老片，我沒有熱情去追新片。你看日本、法國、英國過去那個年代那麼多好片，為什麼？人物素養。我們的電影學校技術越來越高，但是沒有質感。

對我個人來說，不拍也沒有關係，而且我現在覺得拍片對我來說變得非常容易，我不用很多錢，就可以拍我想拍的東西。大家都在想沒有市場怎麼辦？其實不就是創作嗎？一張紙就可以畫畫，我想還是要過得愉快一點。我不想那麼焦慮。

去多用美術館。美術館是要給誰用？我的看法是要給小朋友用，我們的時代是沒有去美術館「郊遊」這個概念的，這和歐洲不同——我們是假裝我們喜歡去美術館，但歐洲人真的很喜歡去，真心喜歡的人是不一樣的，他們是柔軟、聰明、會選擇也更包容的。他們屬於娛樂我也可以接受，可不排斥去看藝術表演，那人就變得比較細膩了，社會也會改變。

我這幾年被美術館掛手是個大好的機會去教育下一代，所以我後來到了拍《臉》時，唯一沒有做到的事，是它還是世界發行，我覺得很可惜。它應該只在羅浮宮發行——這樣你要看就去那裡看，電影才更有力量。到了《郊遊》時，我感覺拍電影好像除了發行沒有其他通路，無論拍商業片藝術片都要去商業片系統發行，且通常被邊緣化，觀眾沒機會看到，看的還是那一堆人。當時我就說「我不再拍戲院發行的電影了」，那媒體就喜歡放大說我要退休了，其實我一直在創作，而且我多了一條通路：美術館發行，一間美術館兩萬人看，還有人看不止一次。

姜文受聘浙大兼職教授

20年前，姜文帶著處女作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來到杭州，浙大的學子搶先看了這部片，20年後，趁着「姜文導演生涯20年(杭州)藝術周」的最後一站，姜文重回浙大，並被聘請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兼職教授，還戴上了浙大校徽。

用浙大人的話來說，好久沒有看到排隊聽講座的場景了，上一次還是星雲大師過來時。幾位浙大老師還記得，20年前姜文來時，大家擠在只有100個座位的階梯教室裡交流，進不來教室的人在戶外久久不願離去。然而，即使這次場地換成了可容納1,000多人的大禮堂，現場依然被擠得水洩不通。下午兩點半的活動，最早同學上午10點就趕來排隊了。

姜文拒絕了主辦方安排的10個問題，而是現場隨機挑選了幾個學生來提問，他的回答風格也充滿着幽默和嫵媚。當一位男生問「人生的意義是什麼？」姜文的回答是：「我要知道，我就不來這裡了，我就是想來聊聊。」

還有位女生問：「你曾經說自己不是一個影迷導演，不會向電影致敬。可在電影《一步之遙》裡，我

們分明看到了你致敬了不少經典作品。」姜文回答說：「我不是一個看電影很多人，所以算不上影迷，我只會對自己喜欢的電影反覆看。很多人想做電影，不是崇拜前人，而是覺得，你們不行，我來吧。有點像《俱往矣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》的那種心情，我就是抱著這種心情才做電影的。所以《一步之遙》的開頭，我確實照著《教父》裡的那個鏡頭拍的，但那不叫致敬，就是惡作劇。」

20年前 姜文抽着煙與浙大學子交流

這次和浙大學子的對話，是姜文主動要求的。1994年，姜文帶著導演處女作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來杭州辦個人影展時，就在杭州大學(1998年併入浙江大學)跟學生對話過。雖然姜文已經記不清楚當時聊了些什麼，但他對學生們朝氣蓬勃的熱情印象非常深刻。所以，20年後再來杭州，姜文特別指定了這場活動。

當時擔任杭州大學團委宣傳部長的江山回憶，1994年那場活動做得其實有些倉促，規模也不大，選的是

一個100多人的階梯教室。「那是一次真正面對面零距離的交流，當時也沒有經紀人擋駕，學生有坐着的，有站着的，把講台四周圍得水洩不通。」江山還說，「我記得姜文那時候抽萬寶路，好像在教室點了一根煙，但抽之前特意徵求了一下同學的意見。」

拍電影為了刺激人思考

正如隨行而來的台灣著名電影學者焦雄屏的評價，姜文不希望觀眾變成一個被娛樂的對象，他的作品更多是刺激人的思考。

「我們來影院感動是可以的，流淚也是可以的，但是這不是全部，我們需要思考，需要明白我們在幹嘛，時代在幹嘛，民族在幹嘛。」姜文在現場也道出



姜文與學生交流

了他對電影的思考。姜文早期執導《鬼子來了》時，很多人說應該讓馬大三這個角色哭，這樣就會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。但是，在姜文看來，動之以情是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是曉之以理，兩回事！

「我們的電視，總要有這樣的東西在毒害你們。」姜文質疑，做一個節目為什麼要讓人哭啊？哭就一定動情嗎？「我不認為一個電影非得讓你感動，讓你思考也是可以的。」

「我可能比你們老，我有一種危機的感覺，我看到的情況並沒有那麼樂觀，所以我覺得撒嬌要賴還太早。」姜文認為，電影是要有追求的，而追求在大學裡是要學習的，是通過理性來思考的。「總是用感動、眼淚，這確實是本能，不是一個新時代的學生應該看得上的東西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畫、通訊員 周煒 杭州報道